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 多样化支持：观念与行为^{*}

胡 安 宁

摘 要：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与以家庭为依托的基本养老模式决定了子女对父母的支持直接影响到大多数老龄人口的生活水平。现有理论指出，在社会转型期，孝道的内涵逐渐从传统意义上强调父母子女之间的辈分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顺从义务，转向相互亲情与辈分权威并存的双元模型。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06 年的数据，探讨了权威性孝道与相互性孝道这两个孝道基本维度如何与不同类型的孝行产生联系。多元线性模型的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强调权威关系和子女角色义务的权威性孝道更能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而强调亲情、代际对等地位的相互性孝道则显著促进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性支持。与之对比，孝道的这两个基本维度都无法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进一步的交互效应分析表明，权威性孝道和经济支持之间的联系在年龄低的群体中更显著。此外，对于男性而言，权威性孝道与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之间存在边际显著的正向关系。

关键词：孝道双元模型 权威性孝道 相互性孝道 情感支持 经济支持

作者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变革虽然带来居民家庭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家庭建设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中讲到的，“要加强家庭建设，教育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巩固家庭养老基

^{*} 本研究的初稿曾在 2016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文化社会学分论坛宣读。感谢复旦大学周怡教授、复旦大学研究生杜满以及其他与会者的点评。感谢匿名评审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本研究得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SH030）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71490733）的支持。

基础地位”。^①

家庭建设的开展需要全社会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家教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孝道，而家庭成员身体力行地践行孝道，便能够形成良好的家风。可见，在代际关系方面，家庭、家教与家风的建设是家庭结构、孝道与赡养行为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②

进入到 21 世纪，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截至 2014 年底，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老人已占总人口的 15.5%。^③ 庞大的老龄人口规模带来了巨大的家庭养老压力，也对子女的孝道与孝行提出新的要求。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出发，孝道可定义为个体对于代际关系内涵的认知与理解。鉴于个体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不同个体有可能对“什么是孝顺”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体现出不同类型的孝行。本研究第一次利用全国性的经验资料，展示孝道与孝行之间的复杂联系。具体而言，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与梳理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孝文化的研究，着重分析社会转型和老龄化变迁如何带来人们对于孝道的多角度理解。第二部分，通过分析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展现中国社会转型期个体孝道与孝行之间所存在的多样化联系。以此论证孝道的不同维度如何带来子女对父母不同类型的支持。

二、理论背景

（一）社会转型与传统文化价值

文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议题之一。学者们通常认为，随着社会制度环境的变迁，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亦随之变化。^④ 这一基本命题在 20 世纪中叶的现代化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按照这一理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制度会逐渐向全球扩散。与之伴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会逐渐衰微。基于此，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发展中国家唯有放弃自身传统的价值观念并接纳西方式的道德体系，方能追赶现代化的潮流。这种西化式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2016 年 5 月 30 日，<http://study.ccln.gov.cn/zhongxinzuxx/zyzzjtxx/311319.shtml>，2016 年 6 月 2 日。

② 关于亚洲地区的孝道研究，参见 Charlotte Ikels, *Filial Piety: Practice and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民政部：《2014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506/20150600832371.shtml>。

④ 参见 Alberto Alesina and Paola Giuliano,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3, no. 4, 2015, pp. 898-944.

的现代化理论最主要的应用便是威廉·古德的经典著作《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①在这本书中，古德指出，伴随着工业化、专业分工和人口流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西方社会日渐流行的核心家庭模式会逐渐扩展至其他国家，从而造成全球家庭结构的趋同。在亚洲，核心家庭化的趋势会导致传统的扩展家庭模式日渐式微，进而改变人们的家庭观念，带来家庭孝道伦理的衰落。

然而，上述现代化理论中所预设的“传统文化衰亡论”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质疑。例如，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理论指出，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现代化转型之路，特定社会的传统文化观念并不必然随其现代化进程而消亡。^②这一观点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不谋而合。经济学家阿尔伯特·阿莱斯纳有文章指出，传统文化体系相比于经济体系而言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并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轻易消亡。普特南对于意大利南北部的比较分析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③此外，福山对于信任问题的跨国分析、^④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论述^⑤等经典研究无一例外地强调了文化传统即使在现代社会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需要提及的是，英格尔哈特和贝克尔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通过实证的方式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延续性。^⑥

针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印证了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的持续影响力。^⑦这些经

-
- ① William Goode,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 ② 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vol. 129, no. 1, 2000, pp. 1-29.
- ③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④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 ⑤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p. 22-49.
- ⑥ Ronald Inglehart and Wayne E. Baker,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5, no. 1, 2000, pp. 19-51.
- ⑦ 杜维明：《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14—326页；Lily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eng Yusheng,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9, no. 5, 2004, pp. 1045-1074；Anning Hu, "Ancestor Wor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China Review*, vol. 16, no. 1, 2016, pp. 169-186.

验研究均表明，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本研究从这一基本论断出发，具体分析孝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内涵变迁及其对孝行的多元化影响。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孝道研究

纵观已有文献，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孝道变迁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个阶段，学者们关注的是传统孝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式微”及其成因。^②这些研究均强调了当代中国社会传统孝道由于难以抵挡转型期的冲击而渐趋式微这一论断。

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回应并质疑了孝文化的“式微论”，其可进一步细分为两条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将当代孝道置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变迁的大背景下，从历史的维度论证了孝文化在当代转型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生命力。^③第二条路径则采用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当代社会特定群体如何理解和接纳孝道。^④

上述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的是看孝道的兴衰，而第三阶段的研究则超越了对兴衰本身的讨论，转而思考孝道内涵如何随社会的变迁而改变。例如，人口迁徙，尤其是大量农村中青年人口进城务工使得农村地区难以维持传统意义上的“事亲”孝道，更多的孝行或要通过物质支持的方式（例如给父母寄钱）得以实现。^⑤物质性

① 需要指出的是，孝道与孝文化并不能完全等同。孝道多指个体在理解代际关系时所抱有的价值观，而孝文化多指代宏观社会的文化风气。但是，社会整体特征亦由个体特征所决定，因此，孝文化的兴衰直接和孝道相联系。

② 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皖北李圩村的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③ 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王涤：《关于中国现代新孝道文化特点及其功能作用的探析》，《人口研究》2004年第3期；陈治国：《儒家“孝”观念的原始意义及其近代以来的多重命运》，《孔子研究》2005年第6期。

④ Hsiu-Hsin Tsai, Mei-Hui Chen and Yun-Fang Tsai, “Perceptions of Filial Piety Among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vol. 63, no. 3, 2008, pp. 284-290; 邓凌：《大学生孝道观的调查研究》，《青年研究》2004年第11期；张坤，张文新：《青少年对传统孝道的态度研究》，《心理科学》2004年第6期。

⑤ 参见 Cai Fang et al., *The Elderly and Old Age Support in Rural Chi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2.

孝行在城市居民中间亦日渐流行。^① 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的扩招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国社会青年群体的教育水平，而教育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随着“个体化”价值观念的兴起以及传统集体性家族观念的淡化。^② 相应的，孝道的实践范围也日渐从传统“多代同堂”的大家族转向以父母—子女关系为核心的“两代”家庭。此外，教育机会分配过程中性别差异逐渐缩小，夫妻之间经济地位的对称化和日渐兴起的性别平等思潮冲击着以父权制为特征的传统孝文化。相比于过去，今天孝行中的性别差异日渐淡化。^③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所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亦动摇了传统意义上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观念。^④ 最后，职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全职工作的普及以及人口居住模式的城镇化使得人们越发难以有足够的时间、空间来组织大规模的“丧亲”仪式。^⑤ 因此，相比于“事死”，今天的孝道更加强调“事生”，即在父母健在时对父母的照顾。

综合这些研究不难发现，孝道作为一套伦理价值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逐渐对其内涵进行革新和拓展，形成新的意义系统：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孝道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体现出子女无条件顺从父母的严苛辈分关系，那么今天社会转型期的孝道则在辈分关系之外增添了亲情沟通和亲子地位对等等新元素。一方面是辈分关系与代际义务，另一方面是对等关系与亲密情感，孝道的这两个维度构成了叶光辉等人所提出的孝道双元模型。^⑥

需要说明的是，孝道双元模型理论肇始于小规模的心理实验，但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变迁理论的提出却是基于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大规模调查资料。^⑦ 从这个意义上讲，孝道双元模型理论对于大陆孝道问题的研究具有适用性。当然，这种适用性并非静止不变。笔者并不赞同简单机械的理论套用，而是主张应

-
- ① 邓希泉、风笑天：《城市居民孝道态度与行为的代际比较》，《中国青年研究》2003 年第 3 期。
- ② Chau-Kiu Cheung and Alex Yui-Huen Kwan, “The Erosion of Filial Piety by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Cities,” *Aging and Society*, vol. 29, no. 2, 2009, pp. 179-198.
- ③ 例如，Lihong Shi, “‘Little Quilted Vests to Warm Parents’ Hearts’: Redefining the Gendered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in Rural North-Easter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8, 2009, pp. 348-363.
- ④ Francine M. Deutsch, “Filial Piety, Patrilineality, and China’s One-Child Polic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27, no. 3, 2006, pp. 366-389.
- ⑤ Chau-Kiu Cheung and Alex Yui-Huen Kwan, “The Erosion of Filial Piety by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Cities,” pp. 179-198.
- ⑥ Kuang-Hui Yeh and Olwen Bedford,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6, no. 3, 2003, pp. 215-228.
- ⑦ Kuang-Hui Yeh et al., “Filial P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28, no. 3, 2013, pp. 277-296.

依据大陆具体的实践经验对现有理论进行丰富和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本研究所讨论的不同的孝道维度与具体孝行的连接恰恰是对既有孝道双元模型理论的一种延伸和发展。

(三) 孝道双元模型与研究假设

所谓孝道双元模型,意指当代中国社会人们的孝道所体现出的两个基本维度。其中一个维度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辈分关系以及子女对父母意愿的遵从。这个维度的孝道重视的是传统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伦理期待,体现出的是父母长辈相对于子女所具有的辈分权威。因此,这一维度的孝道可称为“权威性孝道”。^①基于这一孝道维度的伦理要求,“子代必须认同亲子辈分地位之尊卑规范,才能在亲子关系中达成合宜的实践,恰对应于儒家伦理中的‘尊尊’原则”。^②与权威性孝道相比,双元孝道模型中的另外一元称为“相互性孝道”。这一孝道维度的基础在于亲子之间自然产生的情感和亲和状态。子女因为这种情感基础的存在而自发地表现出对父母的关心和支持。显然,与强调辈分身份的权威性孝道相比,相互性孝道体现出的是代际之间在情感关系上的对等性。由于这一孝道维度重视的是亲情,因此其对应于儒家伦理中的“亲亲”原则。^③虽然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代表了孝道伦理的两个不同维度,但在实际生活中,具体的子女的孝道实践往往是这两个维度的结合。因此,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这一对概念并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概括,而是代表了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

在讨论了孝道的两个维度之后,本研究需要细化和操作化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子女对父母的孝行。按照社会支持理论,子女对父母可能存在多种类型的支持。通常而言,学者们将其归为劳动力支持,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三类。^④所谓劳动力支持,是指子女帮助父母料理家务等劳动力付出。经济支持,顾名思义,意指子女在金钱上对父母的资助。最后,情感性支持重视的是父母在亲情上得到满足。通常而言,这一类支持有多种具体的形式,但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方式便是与父母定期交谈,听取父母的心事。

已有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劳动力支持,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都能够显著地提

①② 曹惟纯、叶光辉:《高龄化下的代际关系——台湾民众孝道信念变迁趋势分析(1994—2011)》,《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权威性孝道,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情、理、法内涵。例如,在传统中国社会,孝顺父母是基本的家庭伦理。而到了现代社会,由于法律的规制,孝顺父母成为某种法律责任,因此被纳入到民法法理的范围。与之相比,相互性孝道因为建立在亲情基础上,强调家人间的感情。

④ Benjamin H. Gottlieb, “Social Support as a Focus for Integr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38, no. 3, 1983, pp. 278-287.

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①但是，这三种支持类型之间却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在时间与精力的付出方面，情感性支持因为需要持续性的亲情投入而居于第一位，劳动力支持因为家务本身的弹性（可多可少）而居其次，经济支持排在第三位。另一方面，如果从经济付出的角度出发，这三种支持类型的排序则正好相反。经济支持是最直接的金钱支出。劳动力支持则因为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而涉及小额的经济支出。最后，按照常规的测量，情感支持专注于感情交流，因此财务上的照顾通常不是其考量因素。

那么，这三类子女对父母的支持类型如何和孝道的双元维度联系起来呢？^②这一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经验的社会学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以下的假设。首先，相互性孝道与对父母的情感性支持之间应当具有正向的联系。这是因为二者均是以代际间自发的亲情为出发点。这一共同的情感基础让我们有理由认为，持有相互性孝道观念的子女更加有可能被激发出一种自发的对父母的亲和态度。这种态度进一步促进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性关怀，以提供更多的情感性支持。鉴于此，我们提出：

假设 1：相互性孝道能够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

其次，基于叶光辉等学者的社会心理学解释，权威性孝道的构建依据在于父母与子女对于层级化的家庭角色规范的遵从。^③因此，子女出于一种对权威关系的考虑所展示出的孝行所依据的准则更多的是作为子女对父母所应承担的某种“义务”。基于权威性孝道，孝行的实践主要受子女的角色身份推动。因此，相比于相互性孝道，权威性孝道更加重视外在责任与义务要求，在主动性方面要次于相互性孝道。那么，具有代际平等性意涵的亲子情感在这一维度中并不是特别重要。相应的，无论是正式的法律规定还是个体间达成的非正式协议，承担孝道“义务”的方式主要以金钱支付为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与权威性孝道更加一致的孝行应当是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而非情感性支持。^④

① 李建新：《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3期；张震：《子女生活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促进还是选择》，《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S1期。

② 我们将此三类子女对父母的支持看作是某种孝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类孝行的发生并不必然是出于子女对孝道观念的认同，也有可能出于一种同父母的交换关系，如对父母先前同类支持的一种回馈。对于这种交换动机的考察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③ Kuang-Hui Yeh and Olwen Bedford,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pp. 215-228.

④ 需要说明的是，通常而言，权威关系涉及的是对权力的服从，而这里的权威性孝道强调的是辈分关系所带来的家庭角色义务，并不直接涉及传统封建社会中的父权关系。这里为了保证和已有文献表述一致，故采用“权威性孝道”这一术语。

假设2: 权威性孝道能够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最后, 劳动力支持由于可能同时涉及情感投入和物质投入, 因此, 我们这里初步假定其有可能同时受到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的影响。

假设3: 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都能够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资料(CGSS 2006)。CGSS 2006采用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 相应的抽样单元分别是区(县)、街道(镇)、居委会、住户和居民。其中区(县)、街道(镇)、居委会三级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信息, 以PPS方式抽样。^① 相比于后续的几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6的独特性在于, 其问卷设计与东亚社会调查合作, 单独设立了一个家庭模块。在这个模块中, 我们能够找到测量孝道双元模型的相关题器。此外, 家庭模块中也测量了详尽的子女对父母的多种支持类型。CGSS 2006的这一调查设计非常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需要说明的是, 并非CGSS 2006所有的受调查对象都被要求回答家庭模块中的问题, 在所有的受访者中, 3208个随机受访对象完成了家庭模块问卷, 他们构成了本文的分析对象。

尽管CGSS 2006具有变量测量上的诸多优势, 但其在时效性方面却有一定的局限。遗憾的是, 到目前为止, CGSS 2006是唯一包括个体孝道不同维度测量变量的数据, 无论是其后的历次CGSS调查, 还是其他全国性或地区性的调查, 都没有相关的题器。由于本文经验研究的分析重点在于孝道观念的不同维度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孝行, CGSS 2006是本研究的唯一选择。此外, 虽然一些质性调查也考察了孝道观念的社会影响, 但这一类研究更多关注于孝道对个体生活的意义, 很少对孝道进行类型化, 遑论这些类型与不同孝行的多样化联系。因此, 有关孝道的质性研究对于本文的类型化分析而言缺乏足够的辅助价值, 因此不再赘述。

虽然CGSS 2006的时效性并不理想, 但本研究所考察的孝道—孝行联系是现有文献中的一个理论空白点, 之前并没有相关社会科学研究予以考察, 故而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 相关发现将构成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分析的是基本的文化现象和模式, 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具有一定稳定性。因而,

^① Yanjie Bian and Lulu Li,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3-8): Sample Designs and Data Evaluatio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5, no. 1, 2012, pp. 70-97.

本文结论对今天有启示意义。

（二）测量

我们这里采用了六个陈述性问题来测量被研究对象对孝道的理解。^① 分别是 1. 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2. 无论父母对您如何不好，仍然善待他们；3. 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4. 赡养父母使他们生活更为舒适；5. 子女应该做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6. 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每一个陈述性问题均配有一个七分类的选项（1=非常不同意；2=相当不同意；3=有些不同意；4=无所谓同意不同意；5=有些同意；6=相当同意；7=非常同意）。这些测量变量可以通过因子分析的方式分别产生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的得分，具体分析过程会在下面的讨论中展示。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子女对父母不同的支持类型。CGSS 2006 提供了以下问题进行测量。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为自己父母提供以下帮助？这一问题的答案分为三个类别，分别是 1. 给钱；2. 帮助料理家务（例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代办杂事）或照顾小孩和其他家人；3. 以及听他（们）的心事或想法。很明显，这三种活动分别对应于经济支持、劳动力支持和情感支持。CGSS2006 中，每一种支持类型的答案选项分为五个等级（1=完全没有；2=很少；3=有时；4=经常；5=很经常）。

除了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外，本文在拟合统计模型的时候还考虑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是性别（1=女性；0=男性）、年龄、年龄的平方、是否独生子女（1=是；0=不是）、民族（1=汉族；0=少数民族）、教育年限、婚姻状况（1=未婚；2=已婚；3=离婚或丧偶）、子女数量、个人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户籍身份（1=农村；0=城市）、调查地点（1=城市；0=农村）、中共党员身份（1=是；0=不是）、父亲年龄、父亲教育年限、父亲户籍身份（1=农村；0=城市）、父亲中共党员身份（1=是；0=不是）、父亲的收入情况、^② 母亲年龄、母亲教育年限、母亲户籍身份（1=农村；0=城市）和母亲中共党员身份（1=是；0=不是）。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综合采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的方法。具体而言，本文的分析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基于上述孝道的多个测量指标，利用探索

^① Kuang-Hui Yeh et al., "Filial P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 pp. 277-296.

^② CGSS 2006 仅测量父亲的收入情况。母亲的收入情况无法直接控制，但由于这里已经控制了母亲的其他背景信息以及父亲的经济地位，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母亲的经济地位已经得到了间接控制。

性因子分析的方法,针对每个个体计算出其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的因子得分。这些得分构成了后续回归分析中的自变量。其次,我们拟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子女对父母的支持类型与因子分析所产生的两个孝道维度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子女对父母不同的支持类型是级序变量,因此通常需采用排序逻辑斯蒂回归进行分析。但是排序逻辑斯蒂回归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回归系数在不同模型之间是不可比的。^①考虑到这一限制,很多学者建议采用多元线性模型的方式来进行分析,本文亦采用此分析手段。^②最后,上述分析展示的是孝道与孝行之间基本的关系模式,为了挖掘孝道—孝行二元联系在不同社会人口群组之间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我们在第三步的分析中进一步考虑一系列的交互效应。

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有一点需要说明。通常而言,为了确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人员需要考虑潜在的选择性误差。本文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没有通过进一步的统计手段做这一方面的控制:一方面,本文关心的自变量是不同维度的孝道。对于某个个体而言,孝道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倾向,一旦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短时间内除非经历了剧烈的生活境遇变化,否则难以轻易改变。由于本文的研究群体均为成年人(CGSS 2006的调查对象),我们有一定的理由相信,这些个体所反映出来的孝道是外生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定要处理潜在的混淆变量,那么我们需要找到在时间上先于孝道形成的混淆变量。而后采用工具变量或倾向值方法进行分析。^③但是CGSS 2006中并没有提供这种类型的混淆变量,我们亦无法确切得知受访对象何时塑造其孝道。^④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假设混淆因素存在,我们也无法从CGSS 2006中找到这些混淆变量的具体测量题器,故而我们无法通过统计手段来处理潜在的样本选择性。综合以上因素,潜在的样本选择问题或无必要处理,或无法直接处理。如果未来数据允许,我们会进一步考察选择效应的潜在影响。

① Paul Allison, "Comparing Logit and Probit Coefficients Across Group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28, no. 2, 1999, pp. 186-208.

② Carina Mood, "Logistic Regression: Why We Cannot Do What We Think We Can Do,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6, no. 1, 2010, pp. 67-82.

③ Guido W. Imbens and Donald B. Rubin, *Causal Inference for Statistics, Soci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④ 按照鲁宾(Donald B. Rubin)等人的因果推论理论,我们在处理选择性误差时不能用发生于自变量之后的变量作为混淆变量,否则会倒因为果。因此,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理想的混淆变量应是描述被研究个体青少年生活状态的变量,因为只有这些变量才发生在孝道观念形成以前。很遗憾,这一类变量并没有在CGSS 2006中测量。

数据中的缺失值均通过多元填充（multiple imputation）的方式进行处理。^①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多元填充的时候，因变量的取值不应当被填充，否则会带来统计估计上的误差。^②因此，下面报告中的样本量有可能由于因变量的缺失而小于全部的样本量。

四、经验发现

（一）描述性发现

我们首先报告了变量的基本描述性信息（表1）。通过表1可以看出，我们所分析的样本性别比例基本均衡，平均受访者年龄在42.35岁。整体而言，被研究个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上。在被调查个体中间，超过68%是从城市居民中选取的。农村户籍持有者占40.80%，这说明CGSS 2006的城市部分的调查中，有一部分受访者是居住于城市中的农村户籍人口。在被调查的群体中，大部分已婚（81.02%），且仅有12.53%是独生子女。最后，党员占有所有被调查对象的8.54%。除了被调查对象的信息之外，表1也展示了其父母的基本信息。例如，父母的年龄均在70岁以上。其中，父亲的平均教育水平要高于母亲。

表1 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变量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性别（女性）	54.68%	
年龄	42.35	13.43
民族（汉族）	94.73%	
教育年限	9.36	3.47
个人年收入	9672.83	12768.53
log（个人年收入）	8.78	1.09
户籍身份（农村）	40.80%	
调查地点（城市）	68.45%	
党员身份	8.54%	

① Donald B. Rubin, *Multiple Imputation for Nonresponse in Surveys*, New York: Wiley Interscience, 2004.

② Paul T. von Hippel, "Regression with Missing Ys: An Improved Strategy for Analyzing Multiply Imputed Data,"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37, no. 1, 2007, pp. 83-117.

续表 1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父亲教育年限	0.07	0.25
父亲户籍身份 (农村)	41.21%	
父亲党员身份	5.30%	
母亲教育年限	0.03	0.17
母亲户籍身份 (农村)	42.43%	
母亲党员身份	1.00%	
父亲收入	9054.58	18017.83
母亲年龄	72.54	12.31
父亲年龄	74.58	12.68
离婚或丧偶	5.58%	
已婚	81.02%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2.53%	
子女数量	1.46	1.13
样本量	3208	

图 1 报告了孝道的不同测量变量的基本分布信息。通过图 1 (a)、(b)、(d) 和 (e) 可以发现, 大部分的受访者都同意“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应当心存感激”、“无论父母对您如何不好, 仍然善待他们”、“赡养父母使他们生活更为舒适”以及“子女应该做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这些基本模式表明, 在当代中国社会, 大多数人依然认同基本的孝道原则,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过去几十年剧烈的社会转型并没有带来传统孝道的消亡。

虽然孝道没有消亡, 但是图 1 (c) 和 (f) 表明, 当代中国社会人们对于孝道的理解与传统意义上的孝道已有所不同。例如, 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不同意“放弃个人的志向, 达成父母的心愿”。这与传统孝道对子女无条件顺从父母的严苛要求产生了明显的对比。这一描述性模式表明, 今天人们正逐渐认可并尊重子女对自身志向的追求, 重视个人的生活价值。图 1 (f) 的基本分布状态也反映出类似的信息。基本上, 人们对于传宗接代这一传统观念的认同水平呈现出正态分布的特点, 同意与不同意者基本上各占一半。也就是说, 在转型期中国居民看来, 生育已不像传统社会那样伴随着苛刻的伦理要求。这一发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明, 转型期孝道的内涵的确发生了变化, 相互性孝道的成分在逐渐增多。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模式虽然和一些常识判断相一致, 但是常识判断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主观偏差。与之相比, 通过严格的全国性调查数据分析所证实的这一模式反映的是全国情况, 因此更加稳健, 亦更能够代表中国社会孝道变迁的某些基本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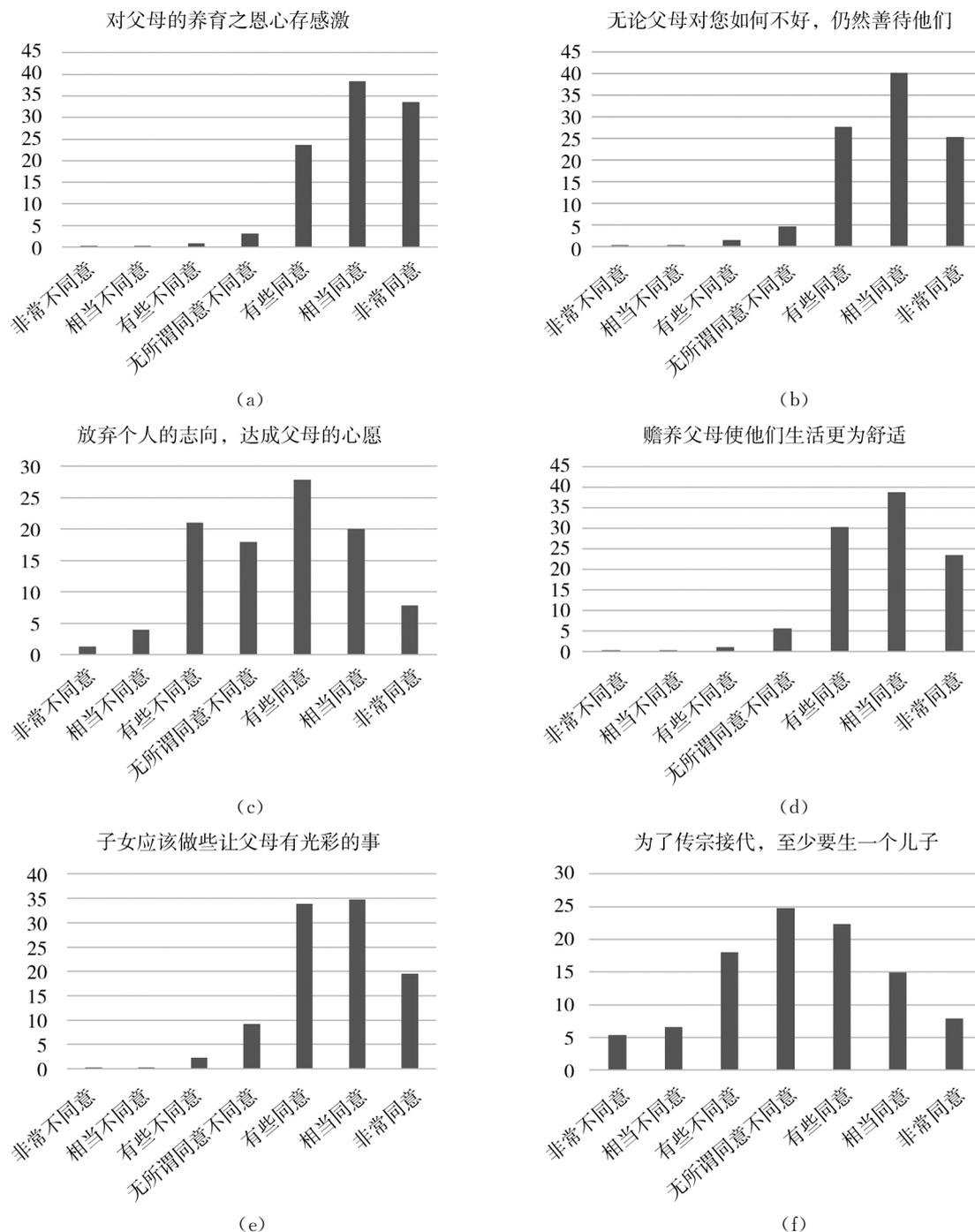


图 1 孝道的不同测量变量

图 2 展示了子女对父母不同类型的支持所呈现出的基本模式。可见，这些类型的基本分布状态都比较接近，整体比例分布偏向于左侧。如果将“经常”和“很经常”这两个类别合并，有接近 24% 的个体在过去的一年中曾经给父母金钱上的帮助。劳动力支持与情感支持则各占 24.51% 和 23.95%。但是，39.21% 的人“完全没有”或者“很少”给父母物质支持，这一比例对于劳动力支持以及情感支持而言则各为 42.4% 和 34.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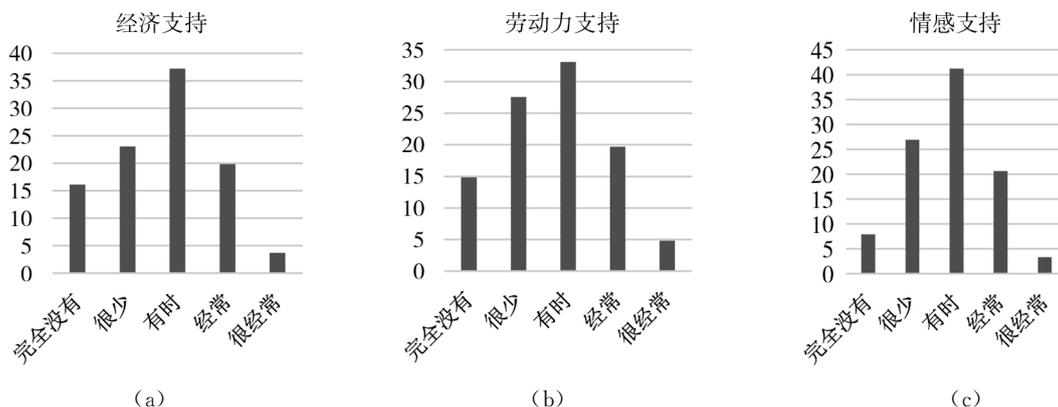


图 2 子女对父母的多种支持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整体而言，人们在观念上还希望为父母尽孝。但是具体到孝行，无论是经济支持、劳动力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都不足被调查者的一半。这种孝道与孝行之间的差异说明，对孝道的认可不一定必然带来具体的孝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孝道和孝行之间的差异与很多因素有关。例如，一种可能的解释，随着面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项目的逐渐优化，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可以独立生活，因而不需要子女的照顾。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则是，一些子女由于自身经济或者时间上的限制，无力为父母提供帮助。这两种解释都是从资源占有的视角出发（例如，父母或者子女的经济状况），而本文的落脚点则是，在给定的资源占有条件下，子女的内在孝道如何与外在的孝行产生联系。

（二）双元孝道模式与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

为了抽离出孝道观念的两个基本维度，我们采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上述的六个测量孝道的变量。^① 利用方差最大旋转法，我们得出两个公因子。其中，公因子 1 涉及的变量是感激父母、善待父母、让父母生活舒适以及让父母增光添彩。考虑到这些测量变量共同强调了子女和父母的情感性联系，我们遵循叶光辉等人的分析将这个公因子命名为相互性孝道。公因子 2 则主要集中在放弃个人志向达成父母心愿以及传宗接代这两个变量上。由于这两个变量强调了子女的辈分义务，因此可以命名为权威性孝道。这两个公因子能够解释掉原始数据 64% 的方差。此外，针对每一个公因子，我们计算了克隆巴赫系数。代表相互性孝道的公因子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79，而代表权威性孝道公因子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47。权威性孝道的克隆巴赫系数之所以相对较低，是因为构造这一孝道维度时只用到两个观测变量。

^① 参见 Kuang-Hui Yeh et al., “Filial P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 pp. 277-296, 虽然叶光辉与合作者采用了同样的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但是他们的结果和这里的并非完全相同。此外，在他们的分析中，权威性孝道的克隆巴赫系数也由于测量变量少而表现出比较小的数值。

因此，这一比较低的系数值本身并不足以作为证据质疑权威性孝道公因子的测量信度。

表 2 双元孝道：因子分析

	因子 1 (相互性孝道)	因子 2 (权威性孝道)
感激父母	0.82	-0.07
善待父母	0.81	0.01
达成心愿	0.13	0.76
生活舒适	0.81	0.11
增光添彩	0.69	0.33
延续香火	-0.03	0.82
阿尔法系数	0.79	0.47
特征值	2.57	1.29
累积解释方差比例	0.64	

基于上述的因子分析结果，我们计算了每一个被研究对象在两个公因子上的得分，这些得分进一步用来分析其对于不同孝行的影响。相关的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 3。通过表 3 可以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的变量之后，子女权威性孝道得分越高，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就越高。另一方面，相互性孝道则与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显著正向相关，这些发现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1 和假设 2。

但是，假设 3 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虽然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的回归系数的点估计值都是正值，但二者都在统计上不显著。针对这一发现，一个可能解释是，相比于其他的支持类型，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或许更多受到现实生活境况而非个体价值观念的推动。如上文所述，我们在测量劳动力支持时采用的变量是帮助料理家务（例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代办杂事）或照顾小孩和其他家人。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假设，在父母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诸如打扫、准备晚餐、买东西、代办杂事等事项是不会由子女代劳的。这也就是说，经常从事此类活动的子女有可能更多是因为其父母无法亲自完成此类活动而不得已为之。同理，照顾小孩或其他家人的活动也更多是由于家庭中有此类现实的需求所致。考虑到劳动力支持的这一特点，我们至少能够部分理解为什么孝道观念没有对其起到显著的促进效果。当然，这一解释仅仅是笔者的一个设想，在未来数据允许的情况下，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验证。

表 3 双元孝道和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回归模型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相互性孝道	0.03	(0.02)	0.01	(0.03)	0.10	(0.02)***
权威性孝道	0.06	(0.02)**	0.03	(0.03)	0.00	(0.02)
性别 (女性)	-0.17	(0.05)***	0.06	(0.06)	0.03	(0.04)
年龄	0.04	(0.02)*	0.05	(0.02)*	0.00	(0.01)

续表 3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年龄平方	0.00	(0.00) [#]	0.00	(0.00) [*]	0.00	(0.00)
民族(汉族)	0.17	(0.10) [#]	0.26	(0.13) [*]	0.20	(0.09) [*]
教育年限	0.01	(0.01)	0.02	(0.01) [*]	0.02	(0.01) [*]
log(个人年收入)	0.16	(0.04) ^{***}	-0.05	(0.04)	-0.01	(0.03)
户籍身份(农村)	0.29	(0.07) ^{***}	0.06	(0.10)	-0.07	(0.06)
调查地点(城市)	0.07	(0.07)	-0.28	(0.10) ^{***}	-0.19	(0.07) ^{***}
党员身份	0.17	(0.09) [#]	0.12	(0.11)	0.12	(0.08)
父亲教育年限	0.02	(0.09)	0.16	(0.12)	0.09	(0.08)
父亲户籍身份(农村)	0.05	(0.09)	-0.18	(0.10) [#]	-0.07	(0.08)
父亲党员身份	-0.13	(0.10)	-0.26	(0.11) [*]	-0.02	(0.09)
母亲教育年限	0.00	(0.11)	-0.10	(0.17)	-0.03	(0.12)
母亲户籍身份(农村)	-0.06	(0.09)	0.02	(0.03)	-0.18	(0.08) [*]
母亲党员身份	-0.30	(0.23)	0.05	(0.24)	-0.19	(0.20)
是否独生子女(是)	-0.07	(0.08)	0.18	(0.12)	-0.04	(0.07)
子女数量	0.00	(0.03)	-0.06	(0.04)	-0.04	(0.03)
已婚	0.24	(0.09) ^{**}	-0.28	(0.19)	0.04	(0.08)
离婚或丧偶	0.02	(0.14)	-0.37	(0.24)	0.09	(0.13)
父亲收入	0.00	(0.00) [*]	0.00	(0.00)	0.00	(0.00)
母亲年龄	-0.01	(0.01)	0.00	(0.01)	-0.01	(0.01)
父亲年龄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截距	-0.48	(0.36)	1.42	(0.57) ^{**}	2.34	(0.31) ^{***}
样本量	2237		1360		2263	
调整 R ²	0.07		0.05		0.05	

注：1.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数值(括号中是标准误)。

2.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06 年。

(三) 交互效应

在分析了双元孝道和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式之后，我们在这一部分进一步考察这些基本模式是否在不同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群体之间有所变化。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分性别和年龄分别对子样本进行分析。相关发现参见表 4。

通过表 4 可以发现，权威性孝道对于经济支持的正向效果，以及相互性孝道对于情感性支持的正向效果在不同性别群体之间都是稳定的。相比于表 3 中的基本模式，一个不同的发现在于，男性群体中权威性孝道和劳动力支持之间有边际性的正向关系。这说明权威性孝道对于儿子的影响要高于对女儿的影响。表 4 的下半部分是基于不同年龄子样本的分析结果。我们这里将分界值设在 42 岁，是因为该值是分析样本中年龄变量的中位数。在小于 42 岁的子样本中，权威性孝道—经济支持，相

互性孝道—情感支持的联系模式依旧成立。在大于 42 岁的子样本中，仅相互性孝道和情感支持的正向联系得以维持，而权威性孝道没有显著地提升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如何理解这一发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日渐老龄化，如何赡养老人的确成为了很多家庭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相应的，无论是社会主流文化还是政府的政策、法治宣传都偏重于强调子女身份所伴随的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年轻一代中权威性孝道的影响有可能随之强化。

表 4 交互效用

		女性样本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相互性孝道	0.04	(0.03)	0.003	(0.04)	0.08	(0.03)**	
权威性孝道	0.05	(0.03) [#]	-0.005	(0.04)	0.001	(0.03)	
		男性样本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相互性孝道	0.03	(0.03)	0.03	(0.05)	0.13	(0.03)***	
权威性孝道	0.07	(0.03)*	0.1	(0.05) [#]	0.01	(0.03)	
		42 岁以下样本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相互性孝道	0.03	(0.03)	0.03	(0.04)	0.1	(0.02)***	
权威性孝道	0.07	(0.03)*	0.05	(0.04)	0.01	(0.02)	
		42 岁以上样本					
		经济支持		劳动力支持		情感支持	
相互性孝道	0.05	(0.04)	0.003	(0.04)	0.11	(0.03)***	
权威性孝道	0.02	(0.04)	-0.01	(0.05)	-0.01	(0.04)	

注：1. 表中的系数估计基于表 3 的回归模型设定，所有控制变量均纳入模型。

2.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值（括号中是标准误）。

3.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06 年。

五、结论与讨论

如何建设家庭，构建良好的家教与家风是当前家庭建设的重中之重。本研究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在家庭人口结构日益老龄化的今天，作为家教重要组成部分的孝道所体现出的多个维度，以及不同维度如何促进不同类型的孝行，以弘扬尊老、敬老的良好家风。通过研究发现，当代转型期中国社会，孝道已经逐渐从传统意义上强调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辈分关系和子女的顺从义务，转向平等亲情与辈分权威并存的二元模型。基于此二元模型，本文发现，强调权威关系和子女角色义务的权威性孝道更能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而强调亲情、代际对等地位的相互性孝道则主要促进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性支持。相比较而言，孝道的二元维度

都无法显著地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进一步的交互效应分析发现,年龄越低的人,权威性孝道和对父母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强。这一模式或许是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养老压力激增以及政府偏重强调子女义务的宣传模式所致。此外,于男性而言,权威性孝道与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之间存在边际显著的正向关系。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应对社会老龄化的冲击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由于当前社会化养老模式仍处在摸索过程之中,对于大多数老人而言,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便成为直接决定其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社会背景下,鼓励子女对父母的支持与赡养,弘扬孝行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因此也成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者所着重关注的社会议题。本研究则通过社会科学的经验分析展示了个体孝行与其主观的孝道之间的多样化关联。虽然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使用孝道、孝顺等词汇,但是如何理解孝道在今天已经变得多样化,体现出多维度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维度的孝道会促进不同类型的孝行。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当代中国孝道及其与孝行之间关系的理解,并展示出孝文化的积极价值,弘扬多样化的懂孝、行孝风尚。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前人研究中所提出的“孝道衰亡论”。经验研究表明,无论是权威性孝道还是相互性孝道,均能够起到促进具体孝行的现实作用。换句话说,在老龄化的今天,孝道确实能够起到显著的积极效果,产生实实在在的孝行。孝道不仅没有在转型期的中国消亡,反而能够促进子女对父母的各种支持。

本研究对于优化当代中国社会的养老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例如,老年人群体本身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其对子女所提供的支持有着不同的需求:经济情况比较好的老年人更多地期望得到情感性支持,而经济情况不尽如人意的老年人则更多地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在宣传、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过程中,应有的放矢,对不同类型群体有的侧重于权威性孝道的宣传,有的则侧重于情感性孝道的宣传,以达到最佳宣传效果。

虽然本文研究的是新时期的孝道观念与行为,但孝道本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本文利用大规模经验资料,证实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和意义。首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提升社会福祉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本文所示,特定的传统文化能够和特定的孝行联系在一起。就全社会而言,这些孝行无疑在提升老年人整体生活水平、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考虑到当下社会养老的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极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其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以本研究为例,传统文化并不是简单停留在头脑中的观念和倾向,而是落实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可观、可感的行为。换句话说,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表现和正面作用不仅仅在“想”,更是在“做”。再次,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普遍的影响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① 本研究所使用的全国性调查资料中，被调查对象所体现出的对于孝道观念的普遍认可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也正因为传统文化的这种普及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所带来的正面社会效果不会局限于特定群体，而是普惠全社会。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应当强调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的社会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这一对概念强调了从子女到父母的某种关系，但任何代际联系都是双向的。相应的，我们在谈及孝道时也需要关照父母对于子女的“期待”。当然，这一期待有可能更多地基于辈分关系和长辈身份，也有可能更多地基于相互之间的亲情联系。如何将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和子女对父母的孝行结合起来，以勾勒出当代中国代际关系的双边图景，将是未来社会科学的一个方向。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首先，由于大规模历时性数据的缺乏，我们采用了 CGSS 2006 的截面数据。虽然我们能够证实孝道与孝行之间的二元联系，但是由此二元联系进行进一步的因果推论却需要历时性数据的支持。其次，如上文所述，由于相关混淆变量没有在数据中进行测量，本研究无法通过严格的统计手段考察选择性误差的潜在影响。因此，未来如果有更好的数据，这或是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再次，CGSS 2006 缺乏强有力的时效性，因此本研究所发现的基本模式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孝道与孝行之间的关系更多重在其启示性价值之上。最后，本文只是考虑了三种比较基本的对父母的支持类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应该有更多的类型，因此，未来这方面的研究或需要对孝行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责任编辑：李凌静 责任编审：冯小双〕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2014年4月25日，http://www.gov.cn/ldhd/2014-02/25/content_2621669.htm，2015年5月2日。

strengthen SOEs, we urgently need to focus on mechanisms for innovative systems.

(3)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Reading Ancient Chinese Poetry: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Chen Qingrong and Yang Yiming* • 48 •

Of all literary forms, poetry is the one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and widest circulatio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basic cultural “genes” of the Chinese; it has even shaped their preference, in writing and reading, for language marked by tone patterns, antitheses, and rhyme, assonance, etc. We employed eye-tracking technology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rhyme and poetic character in the reading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rhyme is felt throughout the reading. In other words, at the early stage the expectation of rhyme regulates the poem’s rhymes and in the latter stage it constrai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m’s semantics. This means that in such reading, the Chinese expect a language with harmonious tone patterns and consonance of form and meaning. Research along these lines can provide an initial approach to the exploration of discourse 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4) Diversity of Children’s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Ideas and Behavior *Hu Anning* • 77 •

China’s aging society and the family-based model of basic aged care determine that children’s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majority of the aged population. Existing theories indicate that in an era of social transi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filial piety shift from the traditional emphasis on the parent-child 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children’s duty to obey their parents to a dualistic mode in which family love coexists with the authority of the elders. On the basis of data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6, we explored the ways in which the two basic dimensions of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and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connect with various types of filial behavior. The result of our multivariable linear model shows that on average, the authoritarian type of filial piety that emphasizes authority relationships and children’s duties increases children’s economic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while the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that stresses family love and generational equal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hildren’s emotional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A comparison of the two basic dimensions of filial piety shows that neither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hildren’s labor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shows tha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 205 •

and economic support is more significant among younger groups. In addition, for males, a margin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 exists between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and labor support for parents.

(5) A Chinese Option for an Analytical Model for Anti-Monopoly Law

Ye Weiping • 96 •

The modern analytical model of anti-monopoly law is a fundamental link in the law's application. Since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came into effect in 2008, 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bodies have differed in their application of the law's analytical model, leading to different judgements on the same kind of case. This runs counter to legal unity. In choosing an appropriate analytical model for anti-monopoly law, one should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f both economic analysis and legal formalism; and in drawing on mature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abroad, on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such constraints as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contemporary anti-monopoly law system, the capacity of implementing agencies,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pply of economic analysis, so as to ensure a match between the degree of complexity of analytical model options and economic analysis;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in implemen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cost of abiding by the law for participant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etc. In terms of system design, we should carefully explain the clauses on the purpose of the legislation; set up a typological model suited to the Chinese situation for dealing with behavior; regularize the application of a complete analytical model;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mprove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systems;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agencies of public power to enforce the law.

(6) Freedom of Contract in Company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traint Clause on Disposition of Shares

Feng Guo and Duan Binghua • 116 •

From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law, the disposition of shareholders' rights is not just expressed as the disposition of 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s, but also seen, to a greater extent, in terms of the trading conduct of a corporate organization. The disposition of shares goes beyond being a contractual transaction under civil law to display the features of an organizational transaction under commercial law. The restraint clause on the disposition of shares is found everywhere in company articles and legislation as a sign of the self-imposed restraint of the shareholder's intent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corporation's intent and even on the public will. This clause embodi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 206 •